

## 東亞的復興：我的回應

● 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戈德斯通、趙永佳和穆爾對《東亞的復興》的評論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問題。對其中的某些問題須予以簡單的澄清，至於另一些問題則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圍，需要通過另外的研究計劃加以探討。在以下的回應中，我將盡我所能澄清相關的問題，並說明在我看來最有希望克服《復興》一書的局限性的研究思路。

我們在本書中指出，在十九世紀晚期，東亞在西方的經濟成就面前黯然失色了。下面我就從戈德斯通對我們的這一解釋的評論開始。戈德斯通列舉了技術進步、印度的朝貢和我們所說的「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認為在我們這本書中，這幾個要素重新解釋了東亞的衰落。不過，他認為印度的朝貢並不重要，因為英國累積國債的利息主要是靠國內的資金來源來支付的，在這方面，印度的朝貢無足輕重。在戈德斯通看來，「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也很有疑問，因為只要觀察一下從1600年到1800年這個關鍵時期，就會發現中國人也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迴圈。儘管他贊成有關技術進步的解釋，但他又對書中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材料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材料「僅僅強調了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擴大，彷彿亞當·斯密式的增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當代熊彼特式的增長。事實上，熊彼特式的增長涉及到如下幾個方面的協作：快速產生新發現的科學、科學工程、產品和工序革新」。

這一批評不免讓我吃驚，因為本書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材料都有一個預設前提：亞當·斯密式的增長不會自行產生出西方連續幾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那種技術革新。相反，亞當·斯密式的增長經常會逐漸減弱，最後陷入高水平平衡圈套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我們想要解決的一個關鍵難題恰恰是，英國和西歐怎樣、又為何擺脫了這一圈套，而中國和東亞卻未能擺脫它。

戈德斯通認為，為了理解這一差異，我們有必要仔細關注科學技術在改變歐洲生產的能源基礎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對這一論點不持異議。我們的分歧在於這一轉變的根源。從其論述來判斷，戈德斯通將這一轉變看成是一種與先前發展基本無關的歷史偶然性。相反，我們在《復興》的最後一章指出，這一差異的根源在於，歐洲有一種顯著的模式，即發動戰爭、建立國家和掙錢。這個模式正是戈德斯通所否認的「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在他看來，這個迴圈不足以解釋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因為從1600年到1800年，中國也經歷了同樣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不錯，中國在這個時期也將領土範圍延伸到滿洲、中亞和西藏，但與歐洲相比，這一擴張可謂小巫見大巫——歐洲人佔領了美洲、北亞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資本積累要比領土擴張更難以衡量。不過，即使從這方面來看，中國和東亞在這個時期也沒有出現稍稍可與阿姆斯特丹或倫敦相比的金融市場。

東西方發展差異的根源在於，歐洲有一種顯著的模式，即發動戰爭、建立國家和掙錢。從1600年到1800年，中國也經歷了同樣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但與歐洲相比，這一擴張可謂小巫見大巫。資本積累要比領土擴張更難以衡量。不過，即使從這方面來看，中國和東亞在這個時期也沒有出現稍稍可與阿姆斯特丹或倫敦相比的金融市場。

儘管存在着數量上的差異，但戈德斯通還是正確地強調說，歐洲人用領土和資本所做的事情要比單純的佔有更為重要。無疑，根據我們自己的描述，這兩個世界區域在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方面存在着數量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恰恰反映了如下情況：在這個區域，國與國之間的系統的運作結構和模式存在着諸多差異。在東亞體系中，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主要集中在其中心（中國），而西歐體系則遠遠不是這樣，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經濟上看，都很難判定真正的中心在甚麼地方。再者，儘管不同政治轄區內部和彼此之間的貿易、以及跨越這些政治轄區的貿易對這兩個體系的運作來說都非常重要，但從政治和經濟上看，與近距離貿易形成對比的遠距離貿易（包括兩大體系之間的貿易）在西歐體系中要比在東亞體系中重要得多。這兩個差異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簡單的解釋，有助於說明為甚麼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後，這兩個世界區域走上了愈來愈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和東亞道路更注重建立國家，而不注重發動戰爭；更注重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注重建立海外商業帝國和領土帝國。與中國和東亞相比，英國和西歐走上了正好相反的道路。從十四世紀一直到十八世紀，發動戰爭和建立海外帝國共同構成了西歐體系國與國之間競爭的最典型的形式。這兩種活動同時推動了規模空前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歐洲體系最基本的外向性格。也就是說，若要在體系內部成功地謀求權力，就必須在體系外部獲取資源（人力資源和非人力資源）。

與中國和東亞相比，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英國和西歐走上了發動戰爭和建立海外帝國這種最典型的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道路。這兩種活動同時推動了規模空前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歐洲體系最基本的外向性格，歐洲大國之間軍備競賽的周期性升級；世界上愈來愈多的自然和人力資源被納入歐洲國家的管轄範圍。

如前所述，亞當·斯密式的增長會陷入高水平平衡圈套。與東亞的內向型發展相比，西歐的外向型發展為擺脫這一圈套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在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活動中會出現產品和工藝革新，在這方面，歐洲道路與東亞道路相比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優勢。然而，從另外一些革新來看，歐洲則佔有非常明顯的優勢。這些革新直接地或間接地源於以下三種情況中的一種或多種：歐洲大國之間軍備競賽的周期性升級；國與國之間為爭奪流動資本而展開的激烈競爭；世界上愈來愈多的自然和人力資源被納入歐洲國家的管轄範圍。按照這一解釋，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均為一個「神奇」配方的組成要素。正是憑着這個配方，西方擺脫了亞當·斯密式的動力機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動力機制最終使東方陷入了該圈套。

印度的貢賦只是這種「神奇的」逃脫的一個較晚的、特殊的方面，其數目大大超過了戈德斯通所說的每年600萬英鎊。戈德斯通以每年600萬英鎊作為計算的依據，因而對我們的如下論點提出質疑：「在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自始至終有賴於印度的朝貢。」實際上，我們的論點主要針對的不是每年的600萬英鎊，而是此前和此後的貢賦。實際上，此前的貢賦是東印度公司於1757年從普拉西（Plassey）掠奪來的贓品。這次掠奪幫助英國償還了從荷蘭人那裏借來的國債，並且使英國在幾乎沒有外債負擔的情況下着手進行拿破崙戰爭。相應地，從1792年到1815年，英國公共開支增加了六倍。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為，這個時期英國公共開支的增加在推動產品和技術革新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這些革新塑造了工業革命的資本貨物階段①。

印度後來的朝貢既是軍事的，又是財政的。從軍事上看，完全由印度納稅

人養活的印度軍隊「在維多利亞時期成為擴張主義的外柔內剛的鐵拳……成為支撐着工業資本主義內化進程的主要強制力量」<sup>②</sup>。從財政上看，印度對英國保持着國際收支逆差，對所有其他國家則保持着國際收支順差，這樣就彌補了英國與其他國家的往來帳戶中的赤字。要不是英國有力地控制了印度的國際收支，它就幾乎不可能繼續實行自由貿易，保持倫敦作為世界貨幣和金融中心的地位<sup>③</sup>。

總而言之，印度的貢賦及其在塑造和支撐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實際上，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以前從其海外帝國榨取的貢賦(包括自然、人力和貨幣資源)也同樣如此。我們強調了貢賦在西方的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貢賦的榨取是西方發展的主要動力——更不要說是其唯一動力了。不過，我們確實認為，除了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從海外榨取貢賦也是西方發展道路的一個基本要素。不管怎麼說，我們在印度的貢賦問題上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要比以中國為中心的所謂「朝貢」體系更強烈地依賴於附庸國的納貢，以維持自身的再生產。

這一研究結果——以及其他的研究結果——顯明了《東亞的復興》的一個中心論題：東亞區域體系的歷史遺產具有持久的相關性，不僅能夠說明東亞現時的「興起」，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的全球政治經濟的可能布局。由於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論題，我們在本書中用了過多的篇幅討論東亞歷史遺產中與此論題最具有相關性的那些特徵。趙永佳批評說，這導致了對現代過程的分析的過度壓縮，同時也使我們不能作出理論上的明確說明。我們誠懇接受這一批評，並希望在今後的研究中改正這些缺點。不過，本書所揭示的問題應該提醒人們注意，在研究東亞地區時不要過份依賴主要由西方的問題和經驗形成的各種範式和理論。因此，我並不認為在亞當·斯密與馬克思之間、或在布倫納與沃勒斯坦之間選擇立場(趙永佳期待我們這樣做)會有甚麼大的收穫。一般說來，若要解決新的分析性問題(我們在《復興》最後一章比較了兩個世界區域在過去五百年間的不同發展軌跡，其間所涉及的問題就屬於這種類型)，就需要利用各種新的理論概念，而這些概念很難按已有的分類系統進行歸類<sup>④</sup>。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在描述西歐與東亞發展軌跡的分流及隨後的混融時採納了若干理論概念作為分析的基礎，這些概念既不屬於亞當·斯密，也不屬於馬克思。儘管它們受到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這兩個概念的影響，但韋伯、熊彼特、布勞代爾和麥克尼爾的影響也非常明顯。我的這篇回應不適合於闡明我們在《復興》一書中所作的有關描述的認識論和理論根據。不過，趙永佳在其評論中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在東亞與歐洲的生產關係中發現了某種足以解釋這兩個世界區域的不同發展軌跡的顯著差異呢？我想我可以對此問題作一個簡要答覆。

我的回答是明確的：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差異。生產(按狹義理解，不包括運輸、儲藏和保護)關係的差異在兩個區域內部要比在兩個區域之間大得多。不僅如此，若以五百年的時段來看，東亞與西歐的核心微觀區域(例如彭慕蘭和杉原薰在其撰寫的章節中討論過的那些區域)在生產關係方面的顯著差異與其說是東西分流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我在前面指出，兩個世界區域體系在運作

《東亞的復興》的一個中心論題是：東亞區域體系的歷史遺產具有持久的相關性，不僅能夠說明東亞現時的「興起」，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的全球政治經濟的可能布局。在研究東亞地區時，不要過份依賴主要由西方的問題和經驗形成的各種範式和理論。若要解決新的分析性問題，就需要利用各種新的理論概念，而這些概念很難按已有的分類系統進行歸類。

結構和模式方面存在着諸多差異。就我所能看到的來說，只有這些差異能夠解釋東西方分流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就可以談談穆爾對「大分流」所作的生態學解釋了。穆爾認為水稻的政治生態與小麥的政治生態截然不同。對這個論點，我不持異議。我也同意，水稻的政治生態為東亞的統治集團提供了更好的運用「內部修補機制」的機會，而在歐洲，小麥的政治生態則未能提供這樣的機會。我甚至願意承認，如果把我們的五百年時段進一步延長，從更長的時段來看，那麼，政治生態的差異對後來的分流來說或許會成為一個比我們所認識到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穆爾認為，歐洲的海外擴張是由於領主收入萎縮，又無法通過內部生態修補機制予以克服。穆爾的論點存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據說明，封建領主由於受收入萎縮的影響，因而成為歐洲海外擴張的主要推動力。第二，忽視了城邦和流散各地的跨國商業群體在推動和組織海外擴張過程中發揮的主導作用。

就算是這樣吧，穆爾的一個論點仍然不能讓我信服。穆爾認為，歐洲的海外擴張是由領主收入的萎縮引起的，因為這種萎縮無法通過內部生態修補機制予以克服。沃勒斯坦曾經解釋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折，穆爾的觀點就是從這裏引伸出來的。因此，如同沃勒斯坦的解釋一樣，穆爾的這個論點也存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它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據說明，封建領主由於受收入萎縮的影響，因而成為歐洲海外擴張的主要推動力。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忽視了城邦和流散各地的跨國商業群體——兩者都沒有受到領主收入萎縮的影響——在推動和組織海外擴張過程中發揮的主導作用。隨着時間的推移，海外擴張確實像穆爾所說的那樣提供了一種「外部生態修補機制」，以解決歐洲在近代初期遇到的各種尖銳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不過，除非穆爾從經驗上證明這種修補機制乃出於海外擴張的推動者和組織者的意圖，否則，他的論點就如同沃勒斯坦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西歐統治〔階層〕在封建制度陷入危機的時刻拼死一搏」，結果便產生出資本主義<sup>⑤</sup>）一樣，依舊沒有擺脫目的論的窠臼。

劉鋒 譯

### 註釋

① William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11-12.

② David Washbrook, "South Asia, the World System, and World Capit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 3 (August 1990): 481.

③ Marcello de Cecc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62-63.

④ Giovanni Arrighi,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t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 *Review* 21, no. 1 (1998): 113-29; Giovanni Arrighi,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Macrosociology", in *Soci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ntinuities and Cutting Edges*, ed. Janet L. Abu-Lug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17-33.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view* 15, no. 4 (1992): 613, 615.

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及歷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和世界體系理論。主要著述有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1994)，並合著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999)。